

像土地般朴素真诚的长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钱文忠



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,季羨林先生也已经是73岁,年过古稀了。撇开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、名誉、地位不说,就单论年龄,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。

尊敬前贤恭恭敬敬

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?对比自己年长的人——当时冯友兰、王力、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——季老是非常尊敬的。根据我的日记,1990年的1月31日,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、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。路上结着薄冰,天气是非常寒冷,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,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。

先到朱光潜先生家,只有朱夫人在,季先生身板笔直,坐在旧沙发的角上,恭恭敬敬地贺年。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,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,季先生身板笔直,坐在旧沙发的角上,恭恭敬敬地贺年。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,陈先生倒是在家的,看到季先生来访,颇为惊喜。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,坐在旧沙发的角上,恭恭敬敬地贺年。其时正好两卷本《陈岱孙文集》出版,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,题签,起身,半躬着腰,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。季先生也是起身,半躬着腰,双手接

接过,连声说“谢谢,谢谢”。冬天柔和的阳光,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……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,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褒扬后学提携晚进

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越的专家学者,在将近20年前,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,行辈、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。季先生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、尊重,不遗余力地表扬他们。

一天,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,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,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。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,低声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?裘先生,古文字专家,专家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翘起大拇指,微微地晃动。

还有一次,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评职称,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圭教授写推荐意见。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,季先生写好封好,命我送给蒋先生。蒋先生拆开一看,愕然说道:“季先生怎么这么写?这可叫我怎么办?”我当然茫然不解,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: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,这样,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?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40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?

那么,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?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。

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,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。一次是请我吃饭。有一年假期,我没有回上海,躲在北大。一天,我

拉上窗帘关紧门,点上蜡烛看书,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窸窣窸窣的声音,一会儿有敲门声。开门一看,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,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,特意来叫我去吃饭。这顿饭吃的什么,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是,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,却至今犹在目前。那些年,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,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,但是,这顿饭是很特别的。

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,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,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。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,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,为了表示感谢,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,邀请卢先生吃饭。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,传为美谈。

年高德劭的长者

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。那么在学术界之外,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?

北大有司机班。大家知道,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,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。然而,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。为什么呢?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,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。可是,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?不能!有几位司机告诉我,他们接送的大人物,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,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,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,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。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。

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,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。但是,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太多了。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,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。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。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,倘若喜欢读书,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。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:“这些钱助你读书,都是爬格子所得,都是干净的。”

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。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,也得到了另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。北大校园里,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,前面倘若有人挡道,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,催促不已的。然而,我却太多次地看到,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,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,他们都会跳下车来,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。不少时候,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。有一年的大年初一,季先生推开家门,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,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们的问候和贺年之词,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。

博大精深饱尝苦难

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,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,相比之下,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,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。

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,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?

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“学术泰斗”、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国宝”之类的

“帽子”,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,但是,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,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憾。

“学术泰斗”、“国宝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,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。“国学大师”云云,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,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。其实,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,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“副业”。

那么,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?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,季先生研究的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、巴利文,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。

季先生的主要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。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。季先生的留学,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,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,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。

因此,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,他的主科是印度学,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,主要精力放在梵文、巴利文、吠陀文、佛教混合梵文、俗语、吐火罗语、俄语、南斯拉夫语、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。

1945年,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,离开德国,到1978年,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,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。这是34岁到65岁,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,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。然而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却是最黯淡无光的苦难时期。

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。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,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社会、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,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。在这个阶段,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,于是继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,不断地发现、补充新材料,进一步论证推行自己的判断和结论。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,研究、翻译、考证了新疆发现的、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《弥勒会见记》,这项研究难度之大、成就之高,震撼了国际学术界。

季先生最大的魅力,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说他的魅力。我这么说,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。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,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。季先生当然不是神,也不是圣人。但是,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,最难得可贵的是,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,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。该守望、该坚持的东西,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。

在那个年代,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,而到了现在,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一个对他人、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,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“走俏”了;一个像土地般朴素、真诚,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,在一个讲究包装、炒作、媚俗的年代里“走俏”了,这就是我说“看不懂”的原因。



钱文忠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,是季羨林先生年逾七旬后所收的北大燕园弟子之一,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主讲人。

在弟子眼中,老人在一个极其冷僻的文史专业领域里始终甘耐寂寞。“用在先生身上的形容词,最合适的大概还是‘纯粹’和‘平淡’。”

在一篇文章中,钱文忠回忆道:季先生平时穿着极其朴素,经常会被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。不止一次,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,替他们看行李。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。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,看见季先生坐在主席台上。

季羨林